

 社会学新视野文丛

上海都市社会实录

(1987-2017)

李骏 朱妍 编

非外借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新视野文丛

上海都市社会实录

(1987-2017)

李骏 朱妍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都市社会实录.1987~2017/李骏,朱妍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社会学新视野文丛)

ISBN 978-7-208-15436-0

I. ①上… II. ①李… ②朱… III. ①城市-社会生活-社会调查-上海-1987—2017 IV. ①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2919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上海都市社会实录(1987—2017)

李骏 朱妍 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5.75
插 页 5
字 数 374,000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436-0/C·577
定 价 78.0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都市社会学”团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资助，
特此致谢！

社会学新视野文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杨 雄

编委会成员：卢汉龙 陆晓文 李 煜

陈建军 程福财 夏国美

曾燕波 陶希东 张结海

总序

卢汉龙

社会学是一门现代学问,要不断提供新的视野。

1978 年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与开放新历史时期的序幕,翌年 3 月,改革与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听取了关于我国理论工作的汇报以后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个讲话站在一个全局和实用的角度,向知识分子提出了为新形势下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期待。就是在这个著名的“补课论”指示下,我国停顿多年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得到了恢复与重建。所以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学正是这样与改革开放同行,记录、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并带来自身学科的建设与成长。

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并迅速融入国际社会。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社会发育、政治民主、精神文明正在成为主宰我国新发展时期里不断递进又相互促进的四大主题。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迫切需要得到科学理论的解释和引导,作为通识性的社会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是我国恢复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以后首批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这次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编撰这套社会学新视野文丛,正是希望从专业的角度提供一个平台,展现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认识与贡献。

社会学新视野首先就是要捕捉和提供各种来自科学理性对社会的探讨。“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知识。除了“科学”知识以外,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还包括“常识”、“哲学”和“宗教”。科学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相当重要,相当现代。如果将知识的“实证性”(经验性)和“解释力”作为两个维度来建立人类知识体系的话,依次构成就是常识—科学—哲学—宗教四个不同层面的知识体系。在人类全部知识体系中,越是处于低层面的知识,它的经验实证性越强,但解释力则会越低;越是处于知识层面高的知识,它们虽能提供较高的解释力,但是它的实证性则越差,有些甚至无法验证。科学是介于常识和哲学意识形态知识之间的一种知识。它具有工具理性的特质,是把不同的经验常识浓缩提炼为一种解释力更高的简约表达。人类社会越是复杂发达,越是不能满足于分散和个别的经验知识,同时也不能接受表面上是有“解释力”,实际上却没有经验事实可以支撑的哲学意识形态理论和宗教信仰。

社会学正是一门重视经验研究的科学知识。作为一门普通的社会科学,它脱胎于实证主义哲学的社会理论(孔德),立足于科学的事实与方法(杜尔汉姆),力求对于人类社会现象作知识性的探究(帕森斯)。所以社会学一直是以科学理性立命,没有科学的精神和经验性方法就没有社会学。国际社会学发展的经验和事实也都表明: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区域内,社会学受到重视和发达的程度是和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理性思维水平有关。凡是崇尚科学理性思维的国家和民族,社会学就容易得到重视和发展,反之亦然。我国社会学发展的兴衰历史同样也佐证了这个规律。新中国成立不久,1952年我国在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取消了“社会学”。1957年,一大批依然希望用科学理性来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学者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恰恰就是一个相当不好的征兆,后来发生的事实也充分说明社会学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不是一种宿命,而是一种违反科学理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改革与开放正是我国恢复集体理性的开始,使中国的发展重新回到了理性的常态。我国当今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科学理性和批判精神来给予回答。科学的理性思维就是不懒惰、不空谈口号,不唯本、不唯上,用经验事实来说明问题,研究论证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途径。实证科学和经验理性正是社会学为政府、为公众所能提供的各种新视野。

社会学新视野也迫切需要以中国社会为题材来建设和发展社会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吸引着各种学科理论对中国的关注。不同的理论兴趣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二是如何从中国的经验中产生不同于已有的理论发现。前者重在印证,后者则致力于创新,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视野就是希望从中国社会研究中寻求和发现对人类社会更全面、更新颖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的本土化,或者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离开国际学术之间的对话将是纸上谈兵,一事无成。科学本无国界,知识贵在积累,就像数理化知识不会有国别差异一样,中西各国之间的社会文化虽然各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会有差异,但是“人性”是一样的,世道人心的差别其实很小。社会是人性的体现,社会学实际上研究的是世道人心的规律。中国社会学尤其需要体现从“个人”出发来看社会的视野。由于中国文化历来具有“集体本位”的特点,人以“群”(即“社会”——严复)分,个人被规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框架里,从而被淹没。中国社会正式系统(国家和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系统的渗透又无孔不入,从而个人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如同“散沙”。这些往往使人们产生中国人没有“社会”的感叹,学界甚至将它作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有根本不同的理由。其实这是因为西方社会学更多是从个人主义的视野来看社会,而中国的社会观则是站在社会本位的立场,难免就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问题。这种可称之为中国社会的“早熟”现象,更是需要我们呼唤社会学的新视野。这些年中国社会的许多现象都已显示,个人主义文化正在勃起,现代化发展已经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和地球村已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就是人性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需要用同样的概念体系和普遍认可的方法来提供创新视野的成果,既为发展中的国家与社会自我服务,也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知识。

社会学新视野还需要强调多学科之间的交融贯通,合作创新。社会学专注现实问题,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十分庞杂,社会学也曾被人或自嘲为“剩余学科”,意思是社会学自持太高,对象不明确,要“科

学”地研究“社会”其实很难做到,它只能专门去研究别人不研究或没人研究的领域内容。社会学的“剩余性”恰恰说明了社会学视野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也要求社会学博采众长,集成创新。面对后工业社会,新产业革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学研究本身也需要拓展眼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新兴媒体和大数据分析之类的现代技术手段,组成各种三棱镜,看万花筒中的精彩世界。

我相信本丛书的编撰和发行能得到学界的支持,会受到读者公众的欢迎和喜爱。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前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持续开展具有全市代表性的随机抽样社会调查,迄今共有十余次,是一笔宝贵的数据财富。都市社会学创新团队将其整理形成“上海都市社会研究纵贯数据库”,并收集了历年来所内同仁用此数据发表的高质量学术论文。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本《上海都市社会实录(1987—2017)》。

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于 2003 年启动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为标志,大规模的随机抽样社会调查开始在中国社会学界兴起。从社会科学日益发展的研究需要来看,单次横截面调查的数据价值有限,但在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跨度、成为重复横截面调查数据之后,对于研究社会变迁就有了巨大意义。CGSS 作为一项全国调查的优势自不待言,但随之而来的一个缺陷是,无法反映特定区域社会的总体情况,而区域之间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正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时间点上远早于 CGSS 的“上海都市社会研究纵贯数据库”,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为学界研究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

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正开始经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通过调查来捕捉这一变革的社会细节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当时,不少机构和跨部门组成的专家课题组开展了多项社会调查,例如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室于 1985 年开展的“改革形势的民意调查”、上海市“办实事”民意调查课题组于 1987 年开展的“听上海市民的心声”调查等。这些调查从多个侧面呈现出上海各社会群体对这场社会经济变革的看法与心态。然而,这些资料是存在缺憾的。一方面,从调查对象来看,上述调查往往针对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例如科学技术从业者、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对于普通市民群体缺乏足够的代表性,也就很难反映

上海社会的总体情况。另一方面,从问卷设计来看,这些调查都侧重实效性,问题设计不够系统,不同课题组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兴趣,这也导致题目十分零散,历年调查缺乏连贯性,也就无法进行跨年度比较。

因此,为了系统记录上海的社会经济生活变迁,对普通民众的家庭结构、工作安排、社会交往、居住状况、生活方式、态度取向等进行跨时期的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同仁开始着手一项“工程”,即定期开展综合社会调查,在上海市辖区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1 000—1 200户居民,入户后用KISH表抽样方法选取户内调查对象,进行结构性问卷访谈。

经多方筹措经费,社会学所终于在1987年进行了第一次上海市区居民生活调查,在上海的十个市辖区抽取了1 200户居民,收集被访者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工作与经济状况、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等信息,形成了第一批翔实的调查资料。据参与这次调查的课题组成员回忆,当时在上海进行入户调查的氛围极为友好,不仅拒访闻所未闻,访问员还常常被留住与受访者家人一同吃饭,受访民众将课题组看作是党和政府汇民意、聚民心的工作组,不遗余力地配合调查工作,并充满诚挚的期待与感激。这种氛围也为数据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被访者会耐心地提供问卷所需的所有信息,在问及收入构成、房屋产权等敏感信息时,时常有被访者表示记不清楚,并热情地找出房产证、工资条等展示给访员看。对于近年来在入户调查过程中屡屡遭拒的同僚们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这种社会信任实在令人感喟。

在1987年的调查之后,社会学所大体以几年一次的频率,对上海市辖区居民进行综合社会调查(个别年份的调查包含上海市近郊或远郊区县)。截至2013年,课题组共计完成了十余次抽样调查,除个别调查的资料数据有所散失,大部分调查的问卷、调查执行报告和原始数据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历次调查在问卷模块设计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1993年调查更加详细地询问了居民的住房与工作状况及其变迁轨迹,收集了被访者当时、之前和16岁时住房的产权归属、房屋类型、面积与朝向、厨卫设备、购房款来源、房租等各种信息,为研究上海市民的住房状况变

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98年调查则针对社区发展与治理设计了专门的模块,详细询问了被访者居住社区的地段、卫生、安全、邻里纽带、群众活动等情况,有助于研究城市建设与改造过程中人们基于社区的交往网络是否得到了重塑;2009年调查对于“后金融危机”时期市民的日常生活变化作了了解,并征询了民众对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各项举措的成效评价。

其中,2008年的调查尤其值得一提。该项调查同时在上海和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进行随机抽样,问卷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同仁历时数月编写而成,是非常严格的跨社会比较研究。两地学者在前期交流中发现,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大国都在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两国民众的经济生活、社会认同、对改革的态度等都值得进行比较研究。这项调查的特色还在于询问了大量有关社会认同的题目,这是以前调查所没有的。基于这一调查所收集的数据,两地学者合作出版了两本著作——《转型中的中国与俄罗斯》与《变迁社会中的社会政策》。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回应了中俄两国学界对于社会变迁的共同关怀,也回应了国际学术界对于转型国家的研究兴趣。

虽然每一轮调查各有其侧重点,但历年调查都详细地采集了市民及其家庭主要成员(如配偶)的生活、工作与居住信息,细致周密地反映了调查时点市民生活的各个面向,为动态研究上海市民乃至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状况的历时性变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获得了十余次调查数据后,社会学所和都市社会学创新团队认为有必要开展第二步的整理工作,也就是将历次社会调查数据整理成“上海都市社会研究纵贯数据库”。这项工作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搜寻和匹配,即对调查的原始资料进行清查。八九十年代的一些调查,其原始资料散落各处,一些数据甚至连变量标签和赋值都没有,数据格式也有不少是ASCII码,要通过细致的工作完成与问卷的一一对应,并完成数据格式转换。

第二阶段的工作是电子化和标准化,即对尚未电子化的原始资料进行电子化处理。早期调查的原始问卷、调查执行报告等资料都没有电子版,为了便于存档和查阅,团队逐一对其进行电子化。在这一过

程中,团队又为原始数据添加了变量标签和数值标签,并将有些变量(主要是复选题和“其他”类选项)进行重新编码,形成了可供直接统计操作的数据库。在完成这一系列的数据清理后,团队又为每一项调查制作了编码本和频数表,并和问卷以及相关支持性文档一起刻成光碟,同时也整理打印成册,便于使用者查阅。

第三阶段的工作是整合。这也是最艰难、最耗时耗力的一项任务,即详细梳理历次调查的问题模块之异同,抽取相同的题目,便于跨时期比较。与此同时,也保留各项调查中的特色模块部分,以满足研究者的个性化需求。这项工作目前仍在不断完善之中。

为了使读者了解“上海都市社会研究纵贯数据库”的基本内容,本书在上篇部分收录了十次调查的原始问卷。同时,为了使读者了解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概貌,本书在下篇部分收录了十篇本所同仁用此数据库产生的重要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老、中、青三代研究者所撰写发表,涉及上海的社会分层、生活质量、社会心态、移民融合、社区发展等主题,集中展现了本所在城市社会学研究领域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

1989—1997年发表的四篇论文,均由社会学所原所长卢汉龙研究员及其合作者发表,主要是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开启了本所定量研究的先河。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历次调查(包括本书已收录和未收录的),正是由卢汉龙研究员与美国林南教授、边燕杰教授、倪伟德(Victor Nee)教授、戴慧思(Deborah S. Davis)教授、约翰·罗根(John R. Logan)教授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章英华研究员和大陆潘允康研究员、关颖研究员、刘欣教授、易松国教授多方合作的结果。

2012—201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均是基于2008年调查数据的中俄比较,分别由社会学所原副所长李煜研究员和刘汶蓉副研究员发表。他们两位既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合作的核心成员,也代表了所内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

2016—2017年发表的四篇论文,均是基于2013年调查数据的上海社会研究。该调查当时由李煜领衔,以社会分层与社会态度研究室成员也即后来的都市社会学创新团队成员为主,包括李骏、康岚、朱妍等。基于该调查,研究团队不仅出版了集体著作《上海市民社会态度报

告》并获得第十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还发表了涉及“土客”关系、住房阶层和社会排斥等诸多主题的论文,很好地实现了用共同调查来整合研究团队的初衷。

回顾“上海都市社会研究纵贯数据库”的建设,应该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历任领导和同仁的支持与奉献。在本书的编纂和出版过程中,朱妍负责上篇调查问卷的整理,李骏负责下篇研究论文的整理。作为本所这一跨世纪“工程”的亲历者,我们觉得,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六十周年这个重要时刻,有必要也有意义将其公开出版,以铭记历史、展望未来。

目录

总序 / 1

前言 / 1

上篇：调查问卷

1987 年上海市区居民生活调查 / 3

1991 年上海市区居民生活质量调查 / 24

1993 年城市居民生活调查(住房与工作) / 47

1995 年上海市社会生活品质调查 / 71

1996 年上海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 / 84

1998 年都市化与社区研究调查 / 95

2005 年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质量)调查 / 112

2008 年上海市民社会生活状况调查 / 128

2009 年上海市区居民民生状况及社会意愿调查 / 151

2013 年上海市民社会心态调查 / 170

下篇：研究论文

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模型探讨(1989 年) / 193

来自个体的社会报告: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分析(1990 年) / 220

“单位制”与住房商品化(1996 年) / 253

住房与中国城市的家庭结构(1997 年) / 271

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的中俄比较(2012 年) / 287

劳动力市场转型的中俄比较(2013 年) / 305

个体化赋权:特大城市中新“土客”关系的调适路径(2016 年) / 322

“谁是外地人”:大都市居民的地域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2017 年) / 336

城市住房阶层的幸福感与公平感差异(2017 年) / 354

利益威胁、文化排斥与受挫怨恨(2017 年) / 376

1987 年上海市居民生活调查

上篇：调查问卷

调查人：李海英、李海英

调查时间：1987年10月10日

调查地点：上海市静安区

调查对象：静安区居民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

调查目的：了解静安区居民生活状况

调查内容：居民生活状况

调查结果：静安区居民生活状况良好

调查结论：静安区居民生活状况良好

调查建议：静安区居民生活状况良好

